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MOE Serial Reports on Development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中国经济增长 报告2016

## 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 China Economic Growth Report 2016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Growth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

主 编 刘 伟

副主编 许宪春 蔡志洲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MOE Serial Reports on Development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中国经济增长 报告2016

## 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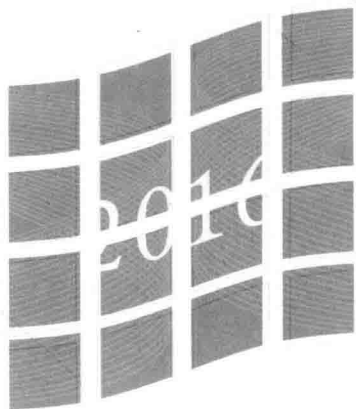
### China Economic Growth Report 2016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Growth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

主 编 刘 伟

副主编 许宪春 蔡志洲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2016: 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刘伟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

ISBN 978-7-301-27534-4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研究报告—2016 IV. ①F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4849 号

**书 名**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 2016——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ZHONGGUO JINGJI ZENGZHANG BAOGAO 2016

**著作责任者** 刘 伟 主编 许宪春 蔡志洲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刘 京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534-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em@pup.cn](mailto:em@pup.cn) QQ:552063295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5 印张 462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 目 录

绪论：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	1
第一节 机遇和挑战 .....	1
第二节 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发生的问题和原因 .....	5
第三节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及其变化 .....	15
第四节 中国能够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 .....	20
第一章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 .....	27
第一节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 .....	27
第二节 怎样看待关于政府统计数据的三项质疑 .....	51
第三节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反映实际情况吗 .....	67
第四节 房地产经济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	79
第二章 从主要经济体比较看中国经济增长 .....	96
第一节 从 GDP 比较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水平 .....	96
第二节 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	101
第三节 从主要经济体比较看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	103
第三章 发达经济“新常态”对中国的启示 .....	108
第一节 科技进步率下滑是发达经济“新常态”的主要根源 .....	108
第二节 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与发达经济“新常态” .....	110
第三节 发达经济“新常态”的运行特点 .....	111
第四节 发达经济“新常态”的具体表现 .....	113
第五节 世界发达经济的前景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114
第四章 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116
第一节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 .....	116



第二节	新常态下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	119
第三节	如何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	125
<b>第五章</b>	<b>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面临的挑战 .....</b>	<b>130</b>
第一节	我国重要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	130
第二节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	140
第三节	思考和建议 .....	146
<b>第六章</b>	<b>21世纪以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b>	<b>149</b>
第一节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 .....	149
第二节	国民收入重要指标和资金流量表 .....	151
第三节	从各个机构部门资金流量看国民收入的分配与使用 .....	166
第四节	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进一步分析 .....	207
第五节	结论 .....	229
<b>第七章</b>	<b>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 .....</b>	<b>235</b>
第一节	新常态与人口政策 .....	235
第二节	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	239
<b>第八章</b>	<b>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的路径与政策 .....</b>	<b>255</b>
第一节	导言 .....	255
第二节	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及流动基本状况 .....	263
第三节	不同流向农业转移人口的群体特征及影响因素 .....	268
第四节	不同流向农业转移人口发展意愿分析 .....	285
第五节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	299
第六节	不同流向农业转移人口发展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 .....	306
第七节	农业转移人口返乡时间及返乡后流向分析 .....	362
第八节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和政策建议 .....	365
<b>第九章</b>	<b>我国能源的供给和需求 .....</b>	<b>369</b>
第一节	从能源视角看供给侧改革 .....	369
第二节	新常态下中国能源需求预测 .....	376
<b>主要参考文献</b>	.....	<b>392</b>

# 绪论：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 第一节 机遇和挑战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什么机会呢？在我们眼前有三大机遇。至 2020 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2030 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50 年，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

### 一、至 2020 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 1978—2015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 9.6%，即实现了 9% 以上的年均高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开创长期高速增长纪录的是日本，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保持了 20 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 26 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韩国又以 30 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再创一个新的纪录。接下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 1978 年到 2015 年，一共 37 年的时间，实现了年均 9.6% 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与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总量来看，2015 年年底中国 GDP 达到 67.7 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为 1978 年的 29.9 倍。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 GDP 来看，2015 年年末为 49 351 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 8.4%，为 1978 年的 20 倍。中国人口基数大，占全球人口 22%。改革开放 37 年来，在人口总量增长 43% 的情况下，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仍然能够达到 8.4%，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提高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全球人均 GDP 的水平。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 2014 年的人均 GDP 如果按汇率法换算成美元，略超 7 5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 GDP 小于 12 476 美元，高于 4 056 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国家。至 2014 年年末，有 54 个国家属于此类。如果从这个划分标准来看，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之列。从目前情况看，在列入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中 70 个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其中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也有一些是石油输出国家。在这 70 个“高收入”国家中，有 20



个人口超过 1 000 万人的“人口大国”。大国经济的特点,是在起飞前的准备和起飞初期,发动得会比较慢,但是到了起飞之后的中后期,特别是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时候,高增长的持续性要比较小的经济体更好。因为它有较为完整的国内的生产 and 分工体系以及较大的内需,具有较强的冲击力和发展惯性。而如果能够保持持续的较高增长,就有可能实现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跨越<sup>①</sup>。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成功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那些大国的历史经验,我们也存在着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可能性。如果以中国在 2010 年达到世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标准为起点线,再用 10 年时间,到了 2020 年,我们能否把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重申了我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首先是在建党 100 年前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是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2020 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点。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与实现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就经济发展本身来讲,它包含的内容也非常广泛。但是从物质基础上看,这些目标都需要以人均 GDP 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提供支持,否则就称不上是建成了小康社会。因此,我们提出来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到 2020 年,中国 GDP 的总量比 2010 年(按可比价格)翻一番”。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40.89 万亿元,翻一番就是 82 万亿元左右。按照 2010 年的汇率换算为 17.6 万亿美元。而美国 2014 年的 GDP 总量是 17.4 万亿多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在 2020 年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中国经济的总量就达到了美国当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提出的另一个数量目标是“到 2020 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变,那就要求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如果这一比重还有所提高,那么城乡居民的收入还有可能增加得更多。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处于人口高峰,未来还有可能减少。所以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增长,现在基本上和 GDP 的增长是同步的。2015 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是 49 000 元人民币,如果人均增长和 GDP 保持同步,即从 2016—2020 年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6.5%—7%,那么到了 2020 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 67 000—69 000 元人民币(按照 2015 年价格计算),按 2015 年的三年平均汇率换算成美元,为 12 000

<sup>①</sup> 根据林毅夫的研究,从 1950 年到 2008 年,只有 13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其中有 8 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去除这 8 个,只有 5 个经济体,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参见林毅夫:“中国 2020 年可能跻身高收入国家”,和讯网,2015 年 10 月 30 日)。而这些东亚经济体完成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大约花了 10 年的时间。

美元左右,这正是目前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起点线。也就是说,如果在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到了2020年,我们就有可能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所以说,如果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经济增长水平来看,则相当于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历史穿越。

## 二、2030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十三五”规划就是实现这个历史穿越的决胜期,这最后五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机会。如果该目标得到实现,中国就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再往下发展,如果不出意外,中国GDP的总量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超过美国。

中国GDP超过美国的意义有多大?在19世纪初叶以前,中国是世界老大。按照麦迪森的研究,182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曾经占到世界的30%多<sup>①</sup>,比美国在当代占比最高的年份还要高(美国GDP占全球最高的年份是2000年前后,2000年为30.7%,这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占比的提高而不断降低,到2014年降到了23.1%,但仍然是世界上GDP占比最高的国家)。但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落后和挨打的历史,中华民族逐渐重视全面学习西方文明。从经济发展来说,中国让出了帝国位置,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到19世纪末德国人曾经一度超过了英国。而到了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又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1913年到现在,美国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已经待了整整一个世纪了。所以,如果在203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总量能够超过美国,重新回到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在我们的民族发展历史上颇有意义。

## 三、2050年,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

再往下的第二个百年,也就是到了本世纪中叶205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均GDP的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现代化,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20世纪的现代化和21世纪的现代化的内涵是不同的。它不仅是个历史的范畴,更是一个国际的范畴,一定要在国际上领先,才能叫现代化。也就是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才叫实现了现代化。

这个目标回过头看,就是当年邓小平给中国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的具体实施。

<sup>①</sup> 按照史学家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统计,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西欧各国的总和占23.6%,美国和日本分别占1.8%和3%。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61页,“附录B:1820年以前世界人口、GDP和人均GDP的增长”。





1979年,邓小平同志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1987年接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等外国政要,多次讲到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

第一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解决温饱。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解决温饱的国家,直到1992年,中国840多个县市才取消了粮票和粮食的限价,宣告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这其实就是走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达到按世行的标准的“下中等收入”的起点。

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2000年,实现初步小康。当时提法很简单,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统计还是按照传统苏联的物质资料统计方法(MPS)、用工农业生产总值来统计。但是到十三大报告,由于我国的经济总量统计已经改革为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再用工农业生产总值而开始使用GDP指标(服务业的增加值也放在里面,但是扣除了工农业总产值中的原材料投入以及重复计算的部分),我们的目标调整为接近或达到1000美元,基本实现初步小康。从此中国对经济总量和增长的变化,采取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共同的衡量标准。在2000年,我国经过全面测算,宣布初步小康或总体小康的目标基本达到。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统计学上中等相当于平均数,表述得更精确一点,就是“本世纪中叶,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目前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已经达到了20000美元以上,我们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后来,党和国家又根据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进展,提出了一些中期目标,如从2010年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再翻一番,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把邓小平当年描绘的远景更加具体化了。在实践中我们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而且经济增长仍然充满活力。如果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000美元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甚至更多,在2050年达到25000美元以上(按照2020年可比价格计算),我们就可以说是全面实现了现代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华民族在我们的发展历史上,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过。我们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终于把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带到这样一个门槛上;再给中国5年时间,中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再给中国1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有可能重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再给中国35年的时间,中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

## 第二节 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发生的问题和原因

###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

有机会就有挑战。挑战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这个系统性变化大概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生产)方面,一个是需求(销售)方面。

#### (一) 供给方面:四大成本强势拉高,供给变化中隐藏严重衰退风险

供给产生了哪些变化呢?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总成本概括起来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劳动力、工资成本,人口红利在下降,工资、价格、社会保障福利在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提前到来。中国现在的工资水平上升和社会保障的增加是合理的,因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但对于企业而言,所支付的劳动报酬、社保缴费、公积金等的大幅度提高,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现在60多岁的人已经达到2亿多,进入了老龄社会,可以说中国是“未富先老”,这也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第二个方面的成本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价格大幅度上升,属于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的成本上升。第三个方面就是环境,环境成本也在大幅度上升。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破坏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小,政府和群众也不重视。但是现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宝贵,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它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度越来越强,甚至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河南秋冬之交雾霾比较严重,大家说是因为秋收之后农民烧秸秆。东北入冬后雾霾比较严重,有人说是因为东北冬天烧煤取暖。那么过去河南农民就不烧秸秆吗?过去东北人就不烧煤取暖吗?为什么过去就没有雾霾?为什么现在有了雾霾?实际上,就是整个环境资源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稍有一点变化都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甚至是崩溃。第四个方面的成本就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技术进步主要靠技术模仿,这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技术进步方式;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严,这也是最经济的技术进步方式。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当我们的技术总体进步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了,可以模仿的空间也就变小了,另外,随着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在这一领域中法制化程度越来越高,模仿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技术进步越来越要靠自主研发和创新。而自主研发和创新在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投入最大、周期最长、成本最高。所以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上升。

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的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个时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大、规模扩张来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改



善效率带动增长。如果不进行这种转变、改善效率滞后的话,这种总成本的上升在单位产品成本中消化不掉,它就进入价格,形成这个社会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这种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社会发展来讲属于不稳定因素,人民群众有意见;就经济发展来讲导致国民经济缺乏竞争力,成本高、价格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性。没有竞争性就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就会出现衰退。

(二) 需求方面:从旺盛变成了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

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需求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短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因为穷国的企业家只需关心生产即可,不用关心销路。只要将产品生产出来,就有人排队抢购。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就发生了改变,需求从旺盛变成疲软。

(1) 投资需求疲软。投资为什么会疲软呢?按说居民收入提高,银行存款增加,银行储蓄规模扩大,银行可以把更多的钱贷出去形成投资。但这里其实有一个条件,就是看这个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力如何。如果自主研发创新力不足,情形就会发生变化。过去投资需求增长快,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发达国家往我们这里转移资本、转移技术、转移产品,因为这里的劳动力便宜、资源便宜、环境便宜,成本水平低,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如果政策好,就能吸引到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现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成本不便宜了。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穷的国家,那些地方的生产要素成本更便宜,如果只是比较生产要素成本,外商直接投资就会流向那些国家。这时候就要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或者是进入国际分工合作体系,或者是独立发展,这些都会有比较好的前景。但如果我们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力上不来,这时候,商业银行大量的储蓄就很难在市场上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找不到项目。如果各级政府硬要鼓励银行放款形成投资,那得到的结果经常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形成泡沫,到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就要破灭,企业陷入困境,商业银行则形成大量不良贷款。这在很多地方已经由事实得到了验证。所以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出现银行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成为投资的现象。因此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收入提高了,存款增加了,储蓄扩大了,但是投资能否旺盛地保持增长,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是基本和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自主研发和创新上不去,有钱也投不出去,就会形成投资需求的疲软。

(2) 消费需求疲软。按理说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应该提高。但是它必须依赖于一个前提: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在由低收入及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发展的国家,往往出现收入分配差异扩大的现象,这是这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如果国民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的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收入分配不合理,继续两极分化,把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那就会影响消费能力的提高。我们知道,人的消费是受生理限制的,越是有钱人,消费在

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如果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有钱人的消费增长是有限的。而大部分人的收入增长迟缓,积累了贫困(至少是相对贫困),这些人即使是想增加消费也没有钱,而越是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也就是对未来的预期越差,而预期越差就越不敢花钱,他们会牺牲现在必要的消费,节衣缩食,增大储蓄。储蓄对国家来说是投资,是积累,但是对个人来说是把当前消费转化为未来的消费,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的增长出现下行。

(3) 高失业风险。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总需求的不足。而这就意味着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企业销路不畅,企业资金循环周转有问题。那些欠银行的钱还不上企业,就要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停产、破产的企业增加,失业率就会上去,这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失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也就是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失业率高一点不要紧,因为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分散的,没有组织的。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那么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生活在城市的人群,其中很多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的失业将会形成很大的社会压力。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供求两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一是供给成本上升,消耗不掉,最后就会形成高通胀;二是需求发生了变化,若是不能改善就会出现高失业。高通胀的同时出现高失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 二、能否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之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穿越并达到“高收入”阶段的发展国家和地区,一共有 15 个。这 15 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从“低收入”状态开始,经“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不落下,最后完整地实现“穿越”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其他另外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穿越都不完整,大多数其实是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这种穿越,通过一波发展到达了“中等收入阶段”后,就停留在这个地方。最典型的有三波。

第一波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拉美,一共有十几个国家,它们经过 70 年代以前的发展达到了世界中等收入的水平,但是到了这个水平之后,由于不能适应各种条件的变化,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长期停在这个阶段。一直到今天,算下来有 40 多年了。这些拉美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穿越,而且从 70 年代以后危机不断,墨西哥危机、阿根廷危机、巴西危机、秘鲁危机、智利危机、委内瑞拉的动荡,一路下来,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人们将之称为“拉美漩涡”。



第二波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经济起飞以后,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被带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到80年代达到了“中等收入”甚至是“上中等收入”阶段,像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属于这一波。同样的,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就穿越不过去了,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经济体进行低水平经济规模扩张所形成的过剩的劣质产能,被危机淘汰掉。就算到了今天,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人们将之称为“东亚泡沫”。

第三波发生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西亚、北非这些出现严重动荡的国家,包括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埃及等,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经济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首先它们的政治是稳定的,不管是军事独裁还是家族独裁,它们的社会是稳定的;同时,它们的经济资源是丰富的,拥有丰富的石油、矿山等。这使国际社会对它们有信心,大量外资进入这些国家,又使它们有了充裕的资本,导致它们有一段快速的发展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由于不能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发展也开始停滞。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过去固有的但是能得到缓解和控制的一些矛盾,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军事的矛盾变成危机,和经济危机纠缠在一起,导致了这一地区的全面动荡。这些国家到达中等收入阶段算下来也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它们不但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而且当前的危机什么时候能够完结,现在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人们将之称为“西亚北非危机”。

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形势都不相同,但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警示,我们到了上中等收入的阶段,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我们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过。挑战也非常严峻,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几乎都存在,而且某些方面还很典型。所以当中国是否也可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被提时,还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但是从现在的实际看,这一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具有特殊性,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 三、通货膨胀与经济下行,根源在于结构失衡

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问题,宏观反映的是总量,宏观经济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总量失衡。它无外乎有两种表现:一种失衡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在追逐不足的商品,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不足,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带来高失业。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两种表现,要么高通胀,要么高失业。我们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运

用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这个总量失衡的程度能够调整到国民经济运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 (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一阶段(1998年以前):需求膨胀,供给不足。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个别年份,比如1989年、1990年等,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态。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或者抢购风潮。回过头看,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每次通胀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

第一次通胀是在1985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3%。1984年秋天,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那之前,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个改革的决定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城镇居民担心物价上涨而去抢购,形成了抢购风潮,这是在对通胀预期发生变化后形成的通货膨胀。但是当时的居民购买力有限,而供给又在不断改善,所以到了一定的阶段,供需矛盾得以缓解,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势头也缓和下来。

第二次通货膨胀在1988年。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的工作会议做出了价格闯关的重要部署。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长痛不如短痛,既然要推动经济改革,那么价格改革是早晚的事,还不如一夜之间将价格放开。价格闯关的决定一经做出,又形成了抢购风潮。又因为1988年的老百姓比1984年有钱,这次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8%。后来,中央政府被迫出来宣布价格闯关失败,停止价格闯关,通货膨胀这才慢慢地得以缓解。

第三次是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1%。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党的十四大上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继续推动高速增长。在一系列的利好消息的推动下,我国形成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投资热潮,需求迅速膨胀。这种需求到了1993年之后开始传导到物价上,1994年的物价上升的幅度更大,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1%。

这三次大的抢购都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尽管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供需失衡的情况是类似的。在那个短缺的年代供给不足,但需求开始膨胀,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担心预期值很强,稍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因而形成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长期紧缩的,在货币政策上收紧银根,在财政政策上控制财政赤字,减少财政支出,其目的就是把流通中的购买力和需求管住,防止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二阶段(1998—2010年):需求疲软,产能过剩。

第二个阶段的失衡是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年底,这十几年时间,除了中间个别年份,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1998年那一轮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轻工业消费品。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短缺,生活消费品严重不足,所以改革开放首先要激活生产力,上了很多传统工业项目。比如当时居民家庭的传统三大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后来又有新三大件,即电视、洗衣机、冰箱,产能也增长得很快,到20世纪90年代末就饱和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就开始面临传统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和淘汰,要有新的结构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一轮产能过剩就更严重了,工业投资品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前些年一直高价运行的钢材、木材、水泥,到了2008年这一轮危机之后开始出现过剩,这种过剩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中国黑色冶金的产量占全球产量一半以上,产能就更大,实际上根本消化不了,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内需不足情况下形成的产能过剩,如果有出口支持,那还能消化一部分。但是恰恰不巧的是,我们在这个时期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都很猛,对我国向国际市场出口的冲击都很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做出了一个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也就是说,在出售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时,人家的产品在降价,我们的价格仍然保持不变,等于将市场让给人家。为此我们赢得了世界广泛的尊重,但是赢得尊重是有代价的。2008年的冲击就更大了,2003—2007年,每年出口增长平均在22%以上,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的中国出口增长为负的16%以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很大。

增长动力不足,就会使失业问题更加突出。1998年,我国有3600多万国有职工下岗,1/3乡镇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找不着活,于1998年5月提前返乡。我们始终没用“失业”这个词,我们用的是“下岗”“返乡”,其实就是增长动力不够,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的压力更大一些,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了和前一时期(2003—2008年)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方向上的调整,由紧缩政策改为扩张政策,由于国际市场动荡,特别提出要扩大内需。1998年下半年,我们提出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应对1998年的经济衰退。到了2008年,我们提出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强有力地来刺激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其目的就是寻求增长的新动力,从而避免或缓解可能增加的失业。

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三阶段:既通货膨胀,又经济下行。

2010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这意味着我

们的宏观调控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而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也反映出了新的特征。这个新的阶段现被称为“新常态”。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叫双重风险并存。在前两个阶段,虽然总量失衡很严重,但是方向清楚。第一个阶段就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第二个阶段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所以,第一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是紧缩,第二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是扩张。政策方向很清晰,目标很清楚。

现在是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的话,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的话,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会加剧经济下行。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一方面是需求疲软,增长动力不足,高失业,同时,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滞胀一旦出现之后,政策上就很难办,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他们虽然采取了很多调节办法,但效果不佳。因此,很多人提出凯恩斯的传统经济理论已经失灵。从70年代开始,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手段有了一定的变化,宏观经济理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都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在实际中对缓解经济发展中的短期矛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长期累积的弊端仍然非常严重。可以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是70年代以来为解决滞胀采取的政策调整所形成的政策积弊。这次危机深刻到什么程度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多次发生的周期性危机,没有导致出现全球的负增长,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现负增长。这说明70年代以来为缓解滞胀所采取的政策弊大于利。

## (二) 宏观经济失衡致“双重风险并存”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了发达国家遇到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用“滞胀”这个词,而是“双重风险”,但是,经济的内涵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在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第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

宏观经济失衡看起来是个总量问题,是经济速度快与慢的问题,是经济下行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失衡,是由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所导致的。

为什么我们治理的是通胀而不是通缩?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看,中国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时期。先来看通货膨胀。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非常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三年为负增长,2015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5.2%,从这个指数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看,中国也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我们的消费品价格指





数CPI从2013年以来,长期稳定在3%上下,很多时候降到了2%以下。2015年的CPI为1.4%。考虑到统计误差,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重点不应该是治理通胀,而是防止通缩。因为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胀是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值钱,通缩是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没有钱,通缩意味着市场萧条、降价,意味着企业活力不够,销路不畅,然后导致劳动者的收入减少、失业率上升。所以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的危害性更大,对劳动力大国来说更是如此,治理起来难度也非常大。

按道理中国应该去治理通缩,但是宏观部门特别是央行,对于治理通缩非常谨慎。治理通缩,意味着要向流通领域注入大量的资金,活跃市场需求。为什么我们现实的价格这么低,而我们的货币政策治理通缩却这么谨慎?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潜在的通胀压力,虽然它没表现出来,但是潜在的压力非常大,主要来自结构失衡。

通货膨胀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动力:成本推动与需求拉上。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中国通胀大概50%多一点是来自需求拉上,还有49%多一点,将近50%,是来自成本推动。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期。

先来看成本推动。成本推动主要是我们进入新常态,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要求投入产出结构必须改变,不能再用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经济增长方式了。过去那种增长方式有动力、有效益,是由那时候的要素成本的状况所决定的,要素成本结构中便宜的生产要素的比重大。但是到了现阶段,各种要素成本价格都在大幅度上升,原先便宜的生产要素已经不再便宜,如果还用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由于过去的低要素成本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单位成品的成本就会很高,那么就根本不能适应现阶段经济增长的要求,企业甚至是整个国民经济也就没有竞争力。可是要改变投入产出结构,就意味着要提高创新力和效率。也就是说,要通过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改善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科学技术、劳动、资本、资源、环境等)的组合及使用效率,使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能够获得更大的产出,以消化甚至是降低要素成本上升对单位产品价格的影响,使技术进步而不是增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结构的改变是效率的含义,效率的改变是创新的含义,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要素成本结构迅速改变了,而我们的投入产出结构的改变滞后,对应不足,增加的成本消化不掉,这些成本就进入到价格之中。

再来看需求拉上。所谓需求拉上,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货币供应量大。我国2015年的GDP为67.7万亿元,而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139.2万亿元,M2与GDP的比例达到了2:1以上,远远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比例是